

《独上高楼:王国维传》的审美新价值

王学海¹

(海宁市名人研究院 浙江 海宁 314400)

【摘要】:《独上高楼:王国维传》新版有三大特点:一是从影印本《王乃誉日记》中撷取第一手资料,以资充实;二是补充《王国维传》之不足过程中的新见;三是作为文本的《王乃誉日记》,陈鸿祥先生在甄别史料时以认真为学的精神,就王国维的生活趣味、心性所在、著文精神等,予与了哲学、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求索。《独上高楼:王国维传》是一部保持学术品格的新版王国维传。

【关键词】:《王国维传》 特点 学术品格 审美价值

【中图分类号】:B83-092 **【文献标志码】:**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1671-3079(2020)04-0016-05

一篇好的作品,往往是在不断修改中走过它成熟的历程。一部上乘的研究类学术著作,更是在不断增补新发现的史料、不断自我纠误更新中,才会迎来它丰富和强劲的生命力。陈鸿祥先生的《独上高楼:王国维传》¹便是此中代表。

陈鸿祥先生的《王国维传》,初版于1988年8月,21万字。时隔21年后,以增补13万字的篇幅,并在原书书名前加上“独上高楼”重新出版。此应是其在新版书中所提及“因其所是,正其所误,补其所阙”的实际体现。

《独上高楼:王国维传》,有三个新看点,当为学界关注。

一是作者从影印出版的《王乃誉日记》²中撷取第一手资料,如:详细记述了王国维21岁时离开海宁赴沪寻谋生计的过程,将最真记述的一些史实充实于书中,使研究者从中可以获知最为真切的史实;又可以让一般读者感悟,原来一流的国学大师,年轻外出谋生时,竟然和普通人外出打工如出一辙。在逐步深入阅读中,又足可佐证王国维其时的家境、父亲及亲属们对他的关切与担忧,以及王国维初出远门时的心态。予读者全面认识王国维,更有了一份最为信史般的佐证。而且在王国维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的时间辗转上,又多了一份更为翔实可信的叙述,甚至还可纠正一些已版王氏传记中的失误。而待王国维正式在沪工作开始,即初入《时务报》报馆始,即有领薪数额与原定不符、谒康公(汪康年)和欲另就中西文报馆等“事件”,这样的增写,大大丰厚了王国维初入沪门时的情形与场景。同时,给王国维以新知识生成的东文学社,究竟于何时开办,作者也在查证了《郑孝胥日记》后,确定为戊戌二月十八,公历为1938年3月10日。因为恰巧在这一天,郑孝胥过东文学社,罗振玉、蒋黼“皆衣冠而来”,而郑孝胥则是便服,因是去“缴帖”。在这,他特别注出,“是日为社中开学宴客”。^[1]记述清晰,言之凿凿。

两年后,王国维在拒绝乡试、有背父命的背景下,经罗振玉的斡旋、藤田丰八的热心帮助,终于庚子十二月二十一、公历1901年2月9日,乘坐日本三菱公司的“博爱丸”轮船,由上海东渡,去了东京,在东京物理学校入学,同时,还拜访了后来升任北洋政府外长、其时正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盐官同乡陆宗舆。^{[2]1380}此一增补记述,亦为往昔学界中流传的王氏传记中所鲜见。且此时东渡的资助,亦正来源于罗振玉。以至其父王乃誉也在日记中所书“静得沪罗叙蕴信,知伊之鄂办农馆,以资帮静作游费,令即出申”。^{[2]1322}这也让我们更深层次地知道,罗振玉此时也不是特别有钱,正好张之洞有聘请,便速去了湖北任农务局总理暨武昌农务

作者简介:王学海(1952-),男,浙江海宁人,湖南理工学院客座教授,浙江省美学学会常务理事,嘉兴市“非遗”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,嘉兴市美学学会原会长,海宁王国维研究会名誉会长。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暨名人,兼现当代诗学。

学堂监督,才获得薪金资助王国维出国留学。此类细节与史实,更为历来王氏研究无从获知或无法深知的有据来源。而书中日本东京物理学校遗址,由东京大学博士杨冰女士拍摄,王国维重孙王亮提供照片刊于书中,无疑又给我们增加了历史的现场感。也不由我们会想起静安先生为罗氏整理《殷墟书契考释后序》:“余为商遗先生书《殷墟书契考释》竟作而叹曰:三代以后言古文者,未尝有是书也。夫先生之于书契文字,其蒐集流通之功,盖不在考释之下。……先生早岁即专治文字古训,继乃博综群籍,多识古器,其才与识,固段吴二君之侔。至于从容问,厌任坟典,则吴君之所有志而未逮者也。而此书契文字,又段吴二君所不及也。”“余从先生游久,时时得闻绪论;比草此书,又承写官之乏,颇得窥知大体,扬榷细目。窃叹先生此书,诠释文字,恒得之于天人之表,而根源脉络一一可寻,其择思也至审,而收敛也至宏……窃为我三百年小学,开之者顾先生,而成之者先生也。”^[3]殷殷之言,嗟叹之情,纯出自然,亦为学界中专注罗王不和而生发无穷是非之小心眼者戒。

《独上高楼:王国维传》第四章《迎来了“兴学”热》中,开首便提到了他为崇正讲舍所题写的碑记:“往者,邑人张宝华有志于学校之事,岁癸巳,辟崇正讲舍于城东,制艺之外,兼课士以经史大义及时事等,既而将大有兴作,会戊戌党锢事发未果……今崇正讲舍之建九年矣,邑人将树碑记其事,而以辞属国维。国维窃惟讲舍之成,张君之功为多,顾张君之志,宁遂如斯而已乎?以兴学之艰如彼,又以时与势之不至而姑为此,亦张君之所不得已也。今天子下兴学之诏,时与势殆将至矣”。^[4]静安先生所言的崇正讲舍,建在“城东”,是指先生所居县城(今盐官)之东,也即笔者今所在的浙江省海宁市丁桥镇诸桥街,距静安先生所居盐官约九华里。崇正讲舍后扩建更名为诸桥小学。我们知道,王国维先生是国内第一个引入了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之开拓者,也是在1903年首次在国内发表《论教育之宗旨》,提出了要培养“以人为本,培养德、智、体、美”的“完全之人”。强调教师自身素质的“德、识、望”,并由此大声疾呼要在中国“弘扬哲学,倡导自由,振兴学术”^[4]等先进的美育理念和哲学、教育思想。而在他为崇正讲舍所题写的碑记中,则是更早于此地提出了美育教育的思想。《独上高楼:王国维传》的作者,睿智地看到了此碑记的重要性,先考证出了此题记的政治文化背景,是1901年夏王国维留日归国后,反映出了一些“辛丑变法”的市民百姓之心态与民情,亦是光绪皇帝发出“上谕”,让各省城书院均呼应西学,改为大中小学(省城为大学堂,各府、厅、直隶州为中学堂,各州、县为小学堂)。作者写道:“时间流逝,岁月推移。这时王国维的笔端,对于那位在‘戊戌党锢’中遇难的‘今天子’(载湉)。流露了显而易见的敬意。我们完全有理由说,如果没有这时的‘立学堂’,就不会有四年后(1905)的‘废科举’;兴学是准备,是预演,‘速筹开办’则加速了‘废科举’的进程,是‘废科举’的真正前奏。王国维说,‘时与势殆将至矣’。这是他的真实感触,也是他的历史眼光。尽管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与延亘了二千多年的帝制之掘墓人,是从旧式私塾、书院里走出来的;而后来更大的社会变革与国家建设的杰出人才,则是由这时开始‘速筹’的新式学校造就的。”^[5]此段之说无疑是深入之论。由此再读王国维先生在碑记中所云:“兴学之艰难,虽不可避,然心诚求之,当必有完全之一日者。”^[6]不得不叹服后成为国学大师的眼光与信心。他曾想要在故乡海宁办大学之愿望,亦重新熠熠生辉。

由此辨识,作者又从另一角度去考辨王国维辛丑《杂感》诗。倒不是说作者在《杂感》这首诗中又有了什么新的诠释,而在于周策纵和钱钟书都对此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并各自作了解读。作者在书中指出,周策纵首先理解“不竞”错了,此“不竞”当作“无竞”解,其源在唐张九龄的五言体《咏燕》中。二是诗中所言之人,亦非达尔文,而是张之洞,影射其名高权重之后忘乎昔年高志。而对于钱钟书所运用“西学义谛”的“浪漫主义之企羡”,作者亦指出钱氏查证诗句出处后,尚有百密而一疏,即谓“与沈乙菴游”有误,进而指出,“故‘钱解’《杂感》之失,端在其不明王氏早年学行而强作解人……对王诗原诗旨意,殆无一语道及,则又不免落入舍本逐末、掉书袋之嫌耳”。^[7]可谓中肯不阿,发人深省。由此辨析,我们还可见出作者在《独上高楼:王国维传》中,自在而孜孜矻矻追求的独立精神的行状,以及对王氏生平、遭际与思想的深入的探寻与考究。此于学界,无疑又是一种作学术的纯真榜样的力量。而谓《杂感》一诗是否具有灵魂碰撞之际,作者特意指出陆放翁之《剑南诗稿》,并拈出其中的重点与之比较,恰可给我们提供可资衡析的要点参照。

二是《独上高楼:王国维传》的补证,既是史料的充实,更是新的见解。如第四章第四节从就任通师教职,质疑张謇“废庙立学”,作者先是考证出张謇之所以器重王国维,先是由于张謇与王国维父亲王乃誉有文画相酬的交谊,尔后又谓在王乃誉赞誉张謇砸了寺庙里的菩萨、“废庙立学”的同时,王国维竟以《寺院与学校》(见《教育偶感》)一文,表明了态度:“僧侣之居处之经营之者,且数百年,则其为个人之财产,固已久矣已。乃不顾一切,以强力夺弱者之所有而有之,并使之无所控告,则自僧侣言之,谓之烈于盗贼,诚非过也。设更有强有力者出夺该校而有之,则创设该校者之感情,又当何如?……夫以佛寺与学校较,则似学校有用,

而佛寺无用矣。然以建一校而摇社会之根柢，则其孰得孰失、孰利孰害，宁待知者而决哉！”^{[5]97}作者在书中所引当年王国维之文的话，至今读来，依旧振聋发聩，多有远见。尤其是其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，在此更可谓是一显现！而作者作此新增补，亦是提升此书学术高度之新举。

又如，自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，曾有“罗振玉逼债”一说，致使罗王二家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困惑。《独上高楼：王国维传》中，作者补前传中之缺憾，重点写了王国维后裔所述当时王家就此大事所为的情景，以及对“罗王失和”的态度。譬如1950年代，王国维二子王高明，每月从自己工资中拿出钱给“大归”后返回罗家的王国维大儿媳罗孝纯生活费；1955年现行人民币，也每月取出十元钱按时送去。又若王国维的孙子王庆山说，“大伯母（指罗孝纯）很喜欢我，自己寄住罗家，生活都维持不了，还提出要把我过继给她”。如此补证，足以让钻在“罗王失和”中不能自省的“研究者”清醒之。笔者自20世纪90年代担任王国维研究会会长始，即与王国维儿子王慈明，孙子王庆山，孙女王令之、王令宜、王令尔，重孙王亮等相交甚密，也多次邀请其来海宁参加纪念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讨会，商讨在海宁筹建静安国学院、建造王国维纪念馆等事宜，深知其一族在罗王两家有矛盾的问题上，从未有过激言行，他们随和亲切的心胸与态度，是令人尊敬的。对于王国维长媳罗家二小姐罗孝纯，就笔者掌握的资料：其一是与丈夫王潜明十分恩爱，对王家也无不悦积怨之痕；其二是她十分地不懂生活，更谈不上治理。其洁癖的行为，也大异于人之想象。可以说，看在这一对纯醇夫妻份上，即使双方家长（罗振玉、王国维）有一时之抵牾尖言，亦是一时情绪所致，非如某些偏激者认为是能逼死王国维的主因之一。

再若《独上高楼：王国维传》新增内容中，言静安先生所以能著一部前所未有的《宋元戏曲考》（后改史，系商务印书馆主张），虽系先生平时由《曲录》《优语录》《唐宋大曲考》《古剧脚色考》等积累而成，然另一重大缘由，皆在其家学渊源。虽然王国维生平如其女儿王东明所言，“生平是不看戏的”，但“听戏”，既是他一生的爱好，也是其家学赋予他的又一特长。《独上高楼：王国维传》第七章第五节《〈宋元戏曲考〉的写成及其开创性贡献》中，曾提及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喜好戏曲，能吹箫、唱曲，这在王乃誉日记中时有记载，他兴致所至，便携儿进城，甚至专门坐船去硖石（其时已是海宁经济最发达的一个镇）看戏，且风雨无阻。而必须特别关注的是，王氏的族祖父王欣甫，这是一位对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大有间接影响的重磅人物。王欣甫（1845-1926年），名豫熙，字建候，晚号梦骨，系南宋安化郡王二十九世孙（王沆后裔水北支），王欣甫曾是道光年间附贡生，承袭云骑尉，诰授通议大夫，晋封荣禄大夫，加花翎三品衔。历任赣榆、东台、上元、萧县、汇宁、六合、上海等县知县，直隶州知州。早王国维一年离开人世。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喜好音律，其中擅长昆曲的演唱与登台表演，这份爱好与特长一直保持了50年。常言道，最精的技艺也要有个好平台，在王欣甫出任上海知县期间，正是他借助了这一官方平台，大力提倡昆曲，且不遗余力，四处奔走召唤，始有开创上海度曲之风时，举凡江苏、浙江、江西等许多业余昆曲名家与各类大小团体，都与欣甫先生有直接的联系。单以苏沪两地而言，如度曲名家粟庐、俞振飞等，均由王欣甫推荐介绍而来。尤其应该指出的是，在王国维的故乡浙江省海宁县的县城盐官，逢农历八月十八，有一个已成习俗的民间节庆“观潮节”，这一天，来自邻近省份，乃至全国的四面八方的游客会云集盐官，前来一睹“天下奇观海宁潮”。而王欣甫每每会趁观潮节广发邀帖，诚请各路昆曲名家来盐官举行盛大的曲会，会期自农历八月十六至十八共3天，由此，“海宁潮音”这一说法便蜚声海内外，“海宁潮音、耐园曲声”也成为一时的美谈。如1916年王欣甫已经告老还乡，时年74岁高龄，仍主动举办“耐园雅集”。前来盐官参与度曲名家有俞振飞（17岁）、俞宗海（粟庐，72岁）、应震贤（29岁）、沈颖初（75岁）、朱麟书（72岁）、孔琴伯（69岁）、葛连汀（60岁）、徐若美（64岁）、高山宁（52岁）、潘祥生（50岁）、侯耕华（45岁）、叶桂云（62岁）、王倬章（27岁）。受此项活动辐射的影响，松江东岳庙、杭州韬庵、暮烟别墅，嘉兴南湖烟雨楼等，亦每年都有曲会举行，3对昆曲的发展与普及，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。所以王氏一族，与戏曲是有渊源的。虽然王国维在1898年已经离开家乡，但其童年、少年和青年前期，受家乡热唱戏曲之风的影响，不可谓不大。

三是在《独上高楼：王国维传》中，作者从史料中甄别汲纳材料，以如实入书的原则充实其中，成为重构王氏历史事实的真实全部，让读者能将王氏原来生活与学术研究的足迹，重新安放到原本的位置，并对来源再作深入的探索与思考。这就宛如陈鸿祥先生掌着舵、王氏之船又重新驶入一去不返的历史长河，从中让我们在了解王氏整个人生轨迹的同时，又能对他与世界的关系，作一次重新的再认识。在这其中，陈鸿祥先生又是作为一个中立者的角色，尽可能让史实本身说话，而自己的文本，也就成了一个转述。如前述王国维人生的第一大转折，即在离开故乡去上海谋生，许多王氏传记在记载时，因缺乏详情细节，均语焉不详。陈鸿祥先生则直接从刚刚影印出版的《王乃誉日记》中摘出详情细节，并加以辨析运用，无疑使新传有了更为使人详知与令人信服的效果。

先说对《王乃誉日记》影印本的辨识。王乃誉曾在溧阳县当差做文书类工作(幕僚),其足迹游及苏浙,几多拜识南北诸大家的墨宝与珍藏,平素又喜收藏,识得金文刻篆自不在话下。其原来的老宅在盐官双仁巷,即以颜真卿、颜杲卿两兄弟之清廉为官、造福一方百姓而命名的里弄,自然少不得自小研习二颜之体。其后又深喜董其昌。董其昌行书特点素以“淡”“雅”为显。而王乃誉其书空灵之处,则来自“日临帖数千字”的情绪之间。董其昌的书法神韵,来自字距与行距之间,王乃誉作书,主旨咬定在游衍随意而又谨严之内敛,点画之间,不乏金石之气。其整体中的潇洒飘逸,与他江湖行走之探书觅画收古藏宝有关。就《王乃誉日记》中之书法而论,有南齐书家王僧虔(实则与王乃誉同宗)一言可为佐证:“书之妙道,神采为上,形质次之”。王乃誉写日记,总亦不能先求形质字体之精妙,再行记述之实质。所以王乃誉公之日记书写,当是以即时心情之延宕纵放而书,神采至上。为此,少不了神采之中杂疏漏误笔,放纵之下沾草率之嫌。静安国学院(筹)在借《王乃誉日记》作其中家居原貌资料探索时,特别是让汪君震亮在其《娱庐诗集》作整理与校注时,经常会碰到行书之草难以辨认,同时出现或划弃少字,或双字并列不知所取之难。碰到无法定夺之字,好多字经多次商讨仍无法完全确认的,便又专门请教书法家方才可以放心确认之。就其日记不着标点,又多有典故隐喻之语,若无平日积累较为深厚的古代文学修养之功底,断难以窥其全貌,领其深义。而就这一点而言,陈鸿祥先生在新传中,是下了苦功夫的。当然,就其规范而言,近有东北师大王增宝先生的《〈王乃誉日记〉引用疏误辨之一:年谱等著作类文献》⁴一文,已作了详细的核对、说解与批判,在某种意义上说,是对学术敬畏的一种儆醒、一份忠告。当能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。

因此,一本好的名人传记,除了具有翔实的史料和一些鲜为人知的特例外,首先要具备的是为读者的审美阅读提供传记主人的文化、美学与人文方面的重要之点,予读者有深刻的影响。要做好这一点,作者必须深掘传记主人生命结构中的诗性与思想性的珍宝,以供后人瞻仰与学习。作者在本书新的增补部分,无疑其审美眼光亦在此上游移探究而倾心为之。王国维的生活趣味,他的心性所在,他在著文中文饰所为,以及为师为人的德与道的弘扬与倡导,实是催生了《独上高楼:王国维传》的新审美认识和具有实质性的较为典型的新内容,如第六章《从〈人间词〉到〈人间词话〉》中的第六节《〈人间词〉的哲学意蕴》、第十章《“骑马”紫禁城》中第三节《竭尽“愚忠”发抗议》、第十一章《清华园里欢与悲》中第二节《娓娓动听讲古史,老老实实说“不知”》。结合陈鸿祥先生在《海宁名人》第六辑5上发表的《王国维之死与〈落花〉诗词之考辨》中,其质疑诗的主人归属,以及对学界由此词而起“落花旋风”的批判,既为本书增加了丰厚的学术含量,又为当下的文化阅读增加了审美的现代价值。这恰如因王国维的学术成就,学界与民众会在公共思想文化空间,不自觉地营造一个向心性结构,举凡与王国维有关、且非贬义性的说法出现,就会你我共同助力形成一个超越本事之外的一个特殊的结构,也正如恰如《云梦学刊》2017年第5期上在论《临澧宋玉传说的文化意蕴管窥》中有向心力一说中所指出现象一样,“这种向心力的强力显示,它成为一种不可低估的内驱力,推动了临澧文化信仰的进一步强化、传播与延续”。^[6]此类误读而又不自觉地齐齐合成向心力一说,应该也是一种对经典重新诠释中的主观主体复数作用的文化现象学,值得从哲学现象学的角度去作更深入的探讨,也为更科学更深入地研究王国维,填平了一个陷阱。

著名美学家、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朱立元先生,近在《文汇报》发表文章说,“美学在走向大众时,也要保持哲学品格”。

^[7]《独上高楼:王国维传》的出版,正是保持和提升着其学术的品格,才会赢得出版社的再次青睐和学界的再度关注。

参考文献:

[1]陈鸿祥.独上高楼:王国维传[M].北京:团结出版社,2019:34.

[2]王乃誉.王乃誉日记[G].影印版.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

[3]王国维.王国维学术随笔[M]//赵利栋,辑校.二庸轩随录:卷四.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0:240-241.

[4]王国维.王国维全集:14卷[M].杭州:浙江教育出版社;广州:广东教育出版社,2010.

[5]陈鸿祥.王国维传[M].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10.

[6]吴广平,何桂芬.临澧宋玉传说的文化意蕴管窥[J].云梦学刊,2017(3):35-41.

[7]朱立元.美学在走向大众时,也要保持哲学品格[N].文汇报,2019-06-04(12).

注释:

1 陈鸿祥《独上高楼:王国维传》,团结出版社,2019年3月第1版。

2 《王乃誉日记》,中华书局2014年版。

3(1)参见陈宰(王雪康)编《海宁安化王氏家谱》(内刊)。

4(2)此文尚有之二为论文类,之一已刊《嘉兴学院学报》,2019年第3期。

5(3)2018卷,九洲出版社。